

唱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

——第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综述

文 / 本刊记者 沈 聪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联合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话语权与领导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0月16日至17日在京举行。中组部、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联部等单位以及多个国家重点高校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就如何看待话语权与领导权、发展中国家怎样防范“颜色革命”、西方文化霸权的危害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

“颜色革命”今昔

“‘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同属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之下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新霸权主义的基本手段。”与会中外学者就此达成了共识。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发言提出,“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基本理论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时。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即规划着用和平的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杜勒斯兄弟的

“和平演变”战略,针锋相对提出了“反和平演变”战略。苏联的亡党亡国,使得美国更加笃信其和平演变的“魅力”。为了尽快消化吸收冷战结束的成果,美国把对苏联和平演变的经验运用到了中亚、东欧之中。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发言中介绍了“颜色革命”的由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亚、中东、北非以及独联体国家接连发生了旨在推翻现政权的“颜色革命”。如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香柏革命”,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乌克兰的“二次颜色革命”等等。这些公众抗议都采用了一种颜色或花朵作为一种标识来辨认他们的支持者并代表运动的特征,故称“颜色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认为,“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既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的资本垄断利益所在的国家与地区,同时又是反对西方资本强权政治的国家与地区。“颜色革命”套着“文化霸权”,打着“合法”的旗号,对这些国家进行违法颠覆活动,旨在改变现政权,但并不改变其原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企图培植一个亲西方、亲美国的政府,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颜色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指向,就是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当今,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是资本主义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把刀”。和平演变是社会性质的转变,“颜色革命”是执

政权力的更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则往往是“双管齐下”，苏东剧变就是明显例证。

“颜色革命”之实质与表现形式

在已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因追随西方意识形态而付出惨痛代价。

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国祚提出，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既没给人民带来民主，也没给人民带来利益，只带来了政治动乱；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引发的是导致上千人伤亡的骚乱；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延续下来是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分裂、武装冲突、人民流血。香港的“占中”，台湾的“太阳花”、“反课纲”都是所谓“颜色革命”的雏形，虽然翻不了天，但确是个警钟，我们必须警惕。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谓多元多样、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舆论动态只是现象，从本质来说，当今时代主要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元’的对峙。两种力量、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较量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王伟光在会上表示，现在，美国的软战争有三种形式：意识形态战、规制战和金融战。美国一是通过全球不平等的经济规制持久地盘剥世界各国；二是通过主要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搞乱人们的思想；三是通过制造金融风暴搞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然后利用所谓的民意掀起“街头政治”，进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进而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甚至改变这个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

在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看来，“颜色革命”是一种纳粹行为。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蓬·本纳德认为，“颜色革命”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打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为推翻特定目标国家中反对其利益的政治体制所采用的危险的反动策略。

张全景指出，“颜色革命”往往假民主之名以行，以给人民更多自由相许，但革命结果却是人民希望得到的幸福生活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也成为泡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法国大革命时

期，罗兰夫人临刑前留下的这句名言，对于“颜色革命”的结果来说是非常形象的。“颜色革命”与西方的文化霸权给中亚、独联体、中东、北非等地区带来的不是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是战乱、动荡和暴力频发。

文化霸权主义视野下的“颜色革命”

文化霸权主义是霸权主义的新形态和重要组成部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领域的突出反映，也是帝国主义采取的新战略和新统治方式。

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文化当作谋求世界霸权的重要工具，不断提升文化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侵蚀和损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安全。郑科扬认为，文化霸权主义为“颜色革命”的发生打下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以各种形式输出其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影响他国政治经济发展，造成恶果最为严重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新自由主义学说严重干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政治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结果造成政局时常动荡，政治危机频发，这就为“颜色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动荡的社会基础。

王伟光强调，为了“西化”和“分化”中国，西方国家不断在制造和变换手段。近几年来，在对付中国的文化手段上，又提出“四化”新政策，即淡化、丑化、腐化、溶化。“淡化”是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放弃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丑化”是要全力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制度；“腐化”是让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中腐败变质；“溶化”是让马列主义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丧失其指导思想地位。

应对警惕和预防“颜色革命”

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我国发生“颜色革

[政治]

命”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建立和维护更加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中外学者从多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种错误思潮蜂拥而至,不断发酵,互相配合,制造意识形态攻势,其目的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一是企图把我们的改革引导到西化、私有化的方向上去,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通过各种的蛊惑、造谣和任意夸大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三是他们通过各种活动,培植、集结和形成针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派,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结成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这是国内外反共势力企图在中国引爆“颜色革命”所需的社会环境。

王伟光提出,在现代世界格局中,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化产业仍然处在话语霸权地位,这与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仍处于强势、社会主义处于弱势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它与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力量、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强弱对比、此消彼长和反复较量息息相联。

郑科扬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意识,运用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阐述中国学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及其中国式的话语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认为,预防“颜色革命”,从正面来说,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一个涉及各方面工作的系统工程。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其次,在组织上必须使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第三,必须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谓“颜色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胜负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我们不怕有人反对,只怕没有人坚定地支持,也就是说执政党没有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最危险的。第四,必须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上接第21页) 总结的经验,也有需要反思的教训。通过教训的总结和反思,能更好地促进对人民主体认同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引导人民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追求社会主义认同的人民主体思想自觉,要求以人民主体认同为起点,把人民的社会实践生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以人民主体认同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内在机理和创新路径。努力将宏观考察与微观透视的对策研究相结合,针对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变化新期待新趋势,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最佳切入点、对接点,深刻分析面临的思想障碍和方法误区,展开理论反思,探究应对方案,从而实现

理论研究和对策分析的融通。要充分注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中人民主体地位的作用和发挥,理论提炼人民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益需求的系统理论,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实现以人民为创作中心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学理阐释展开深度自我检视和理论反思,特别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文体自觉和问题意识自觉,坚守人民主体立场,实现材料、方法、立场的完美统一,实现问题的政治高度、现实热度、思想深度、历史厚度的辩证统一。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郑建